

拉丁美洲的新榨取主义： 全球资本主义动力机制的新表现^{*}

乌尔里希·布兰德 克里斯蒂娜·迪茨 米里亚姆·兰 著 刘琦 译

[内容提要]本文的目的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语境下来阐明拉美新榨取主义正在形成的政治制度的、地域的和社会生态的动力机制与矛盾。与现有著述相比,我们认为,“新榨取主义”这一术语不只是适用于拥有进步主义政府的那些国家,也应适用于自197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开采和出口的所有拉美社会。我们认为,新榨取主义这一术语的使用经常是模糊的,而如果依据主导性发展模式来理解该术语,则其模糊性将进一步加剧。因此,我们诉诸规制理论以及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进行的历史性的启发式探索。这使得我们能够看清变革中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世界市场结构以及政治制度构型之间的各种时空依存关系,它们是跨越不同层面和国界的新榨取主义的特征。

[关键词] 资本主义 新榨取主义 拉丁美洲 规制理论

一、引言

21世纪的商品繁荣在社会、政治、生态和发展方面所带来的影响一直饱受争议,特别是在拉美地区。这并不奇怪,因为初级商品领域的全球性繁荣对拉美的政策、增长率以及以出口为目的的资源开采的扩大都有着特殊的影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东南亚等世界其他地区,同样可以看到资源繁荣(resource boom)所造成

的类似影响。2000—2010年间,拉美地区国民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丰富的原材料成为该地区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不断增长的外汇收入、初级产业部门在GDP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集中于自然资源开采和初级商品领域(尤其是采矿业)的国外直接投资加速增长。各国政府,特

^{*} 本文原载《政治科学》(*Ciencia Política*)2016年第11期。

别是那些由左翼自由主义政府或者左翼色彩更浓的政府执政的国家,在社会政策方面获得了新的行动空间。因此,从资源部门获得的额外收入的分配可以降低贫困率和减少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尤其是在委瑞内拉)。

但从2011年开始,特别是2014年下半年,不仅石油价格,而且包括矿产和出口农产品(如大豆)在内的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大幅下滑。据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委会(ECLAC)统计,2011年至2015年5月,金属价格下跌了39%,经济作物价格下降了29%;2014年7月至2015年1月的仅仅7个月里,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产品的价格下降了52%。后者出现价格急剧暴跌被归因于需求的减少(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放缓导致需求减少)以及总产量的增加(与此关系最密切的是美国通过水力压裂技术进军石油和天然气市场),而大宗商品日益金融化导致的投机因素也是原因之一。尽管这次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影响各有不同,但可以说,它导致了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减速,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造成了经济衰退。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增加税收收入、扩大资源开采活动的范围以及增加大宗商品的绝对出口量,来减少其负面影响。

关于拉美的新榨取主义已有许多报道、争论和著述。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撰写文章来讨论这一议题呢?本文缘起于有关该议题的现有的学术争论和政治争论,文章的目的有两个方面。第一,借助于规制理论,我们将把新榨取主义描述为一种发展模式,从而对其形成一种具有理论基础的诠释。我们所理解的发展模式意指一个大致上有着地域界定的单位,其中一整套确定的文化和社会习俗以及精神图式成

为(至少部分成为)支配性的,并在国家或地方层面上转化为一种制度化的妥协。因此,发展模式是一种大体稳定的积累体制、一种工业/发展范式和一种支撑前两者的规制模式的互补性组合。此外,这一助力型组合可以被视为大规模社会斗争和运动的意外结果。

第二,我们的目标是评估当前拉美的新榨取主义在政治制度、地域和社会生态方面的动力机制和矛盾。这一评估并不局限于国家或区域范围(即在国家边界范围内),而是在不断演变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一点与第一点的联系在于,作为一种发展模式的新榨取主义需要被置于全球背景之中。我们的论点并非是世界市场决定论;换言之,我们并不认为新榨取主义作为一种发展模式仅仅是国际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展现。相反,我们关注的是全球性危机时期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积累条件与国家或地区层面的社会政治和社会生态的重建过程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二、拉美的“古典”榨取主义与新榨取主义: 争论与证据

“榨取主义”和“新榨取主义”这些术语与批判一种资本主义主导的、以原材料的开采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复兴密切相关,自2000年以来许多拉美国家遵循着这一模式。爱德华多·古迪纳斯(Eduardo Gudynas)、阿尔贝托·阿科斯塔(Alberto Acosta)和马里斯特拉·斯万帕(Maristella Svampa)等学者在使用榨取主义概念时,所指的是那种主要基于资源开采和自然估值、但并不涉及分配政治的经济活动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而新榨取主

义则与利用资源开采活动所获得的收益来消除贫困、提高民众的物质福利的国家政府相关。

(一) 当前关于古典榨取主义和新榨取主义的争论

总体而言,榨取主义既被视为一种积累战略,也被视为一种与之相关联的经济结构,“其基础是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以及资本主义向以前被视为与生产无关的领域的不断扩张”。与新榨取主义相关的其他主要特征还包括部分拒绝新自由主义政策、特定原材料产业(石油、天然气、矿产)的部分国有化、对占用资源及其利润进行更有力的政治控制以及社会政治项目的扩展。这一“后新自由主义”(post-neoliberalism)模式的榨取主义的实例既存在于在左翼自由主义政府领导下的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的近期发展中,也存在于由左翼色彩更浓的政府统治的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等国家中。这种“新”榨取主义在拉美的争论中被界定为不同于“古典的”或“保守主义的”榨取主义,后者的特征是跨国化、放松管制和私有化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式的长期存续。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被视为后一种模式的典型。古迪纳斯也强调指出,保守主义的榨取主义寻求建立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合法性,而进步的新榨取主义则通过民族主义的或反帝国主义的话语来实现这一目的,认为自然资源应该民有和民享。

阿科斯塔将榨取主义的两个版本(即古典榨取主义和新榨取主义)分别与相应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发展主义联系起来,并认为新榨取主义是以国家民粹主义的社会政治信条(dispositif)为基础的,这一信条在策略上发挥着政治合法化来源的作用。换言之,作为该发展模式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新榨取主义为作为一种旨在促进国家发展、主权和社会再分配的行动计划自然资源开采提供了合法性论证。特别是在左翼政府治下的安第斯地区国家(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中,与贫困和社会不平等作斗争的必要性为原材料开采提供了社会政治上的合法性辩护。

在我们看来,进步主义的榨取主义与自由主义/古典的榨取主义之间,或者“新榨取主义”与“古典榨取主义”之间的区别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历史形态这一层面,也就是说,取决于具体国家在特定时间的境况。特别是当我们深入考察这些形态(这里我们不打算这样做)时,应该把这种差异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但我们想强调的是,尽管这些差异肯定存在,但不同国家之间的共同点正变得日益明显。这与占用自然资源的政治实践和国际格局的重要性有关。依此,我们想提醒的是,在分析古典榨取主义与新榨取主义时,不应高估其政府形式导致的国家之间的差异。接下来,我们将集中讨论新榨取主义,用其指称一种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模式,在其中,自然资源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估值对于交换价值的实现起着决定性作用,并且这一发展模式在不同政治制度中展现出了共同点。

(二) 拉美榨取主义的现实进展

尽管其政府的政治倾向不同,但当着眼于宏观经济趋势时,不同拉美国家间的共同点就变得清晰可见了。2011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ECLAC)观察到了这一地区退化或回归到初级商品生产的趋势,这意味着许多国家的经济发生了产业的重新初级化(reprimarization)。这一建立在出口基础上的原材料繁荣(raw materials boom)在安第斯地区

尤为明显,但即使是在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国家(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中,原材料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上升。但是,这种重新初级化理论并不只是建立在价格上涨带来的出口价值上涨的基础之上。如果看一下几个国家的绝对开采量和产量,我们同样会发现它们向榨取主义经济发展的明显趋势:在玻利维亚,2000—2008年天然气产量增长了两倍;而在1990—2008年间,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量增长了50%至100%。在巴西、智利和秘鲁,采矿业的开采量和生产量的增长同样是显著的。在诸如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厄瓜多尔这些国家,采矿业并非是其传统行业,却得以不断扩展,这是衡量新榨取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格局变化的尤为重要的指标。

因此,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在2014年商品价格大幅下滑之前,不仅是价格推动的初级出口产品的货币价值上涨导致了拉美地区的原材料繁荣,战略性原材料开采量的增加同样也促进了榨取型增长模式在拉美地区的扩展。另外,如果将出口价值和绝对开采量或生产量与GDP相联系,即便考虑到各地发展各自的特征,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到拉美向资源榨取型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2011年委内瑞拉的初级产品部门在GDP中的比重为32.3%,而2000年为21.9%;在阿根廷和玻利维亚,也能够观察到类似的趋势。1998年,石油占委内瑞拉出口总额的68.7%,而近年来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96%。2013年,初级产品占厄瓜多尔所有出口的80.8%,而自2012年以来,其制成品所占出口份额下降了11%。

在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如玻利维亚和

委内瑞拉,原材料收入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高比例表明了这一发展模式的固化。其他的例子包括:1990年至2008年间,智利的国家预算中以原材料为基础的收入所占比例从28%上升到34%;在哥伦比亚,这一比例从8%上升至18%;而在墨西哥,则从30%上升至37%。总体而言,人们的打算是,原材料开采为经济打下基础,通过它可以维持经济增长,在特定政治条件下还可以实现再分配的目标;即便是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时期,也能如此。与此同时,该地区的贫困现象显著减少,其中赤贫率从1999年的近44%下降到2010年的31%(拉加经委会2012年数据)。然而,目前拉美总人口的19%仍依赖于政府救济和社会福利项目,而如果原材料世界市场价格大幅下滑,则这一减贫趋势很可能被轻易扭转。

借用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1997年的著名隐喻,拉美的血管似乎被再次切开,但这次至少在某些方面带来了一些正面影响,并且所处的条件不同。这一次,流淌出来的“血液”并不只是让国内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以及跨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获益,或者只是为了维持和提升北方富裕国家的帝国式生活方式。相反,在许多国家,流淌出来的“血液”也使其他阶层的民众获益,用以应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稳定更加捉襟见肘的国家预算。特别是在所谓进步主义政府执政的国家,比如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尤其如此。近年来,这些国家采取的后新自由主义政府干预措施包括如下形式:对原材料进行部分国有化,从原材料生产中获取高额利润,征收出口税,以及建立某些社会福利项目,这里列举的是最重要的措施。

尽管取得了这些重要成就,但在过去几年中,批评和质疑的声音日益增长。批评主要针对的是这一发展模式的社会和生态成本的时空外化、政治权力的重新集中化以及对社会权利、区域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漠视。在谈及各种榨取主义实践(特别是采矿业、农用工业和化石燃料开采)时,批评者指出,各种区域的变化过程导致了自然景观以及社会和劳动关系的重组,并造成了空间上的分割。这些过程具有如下特征:新的区域边界和范围的划定、飞地经济的出现、专有使用权的强制施行、自然资源使用的非民主化以及广泛存在的生态破坏。同样,批评还指向了西方社会中从未被动摇的进步理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增长范式。最近出现的另一种批判声音集中指向的是减贫战略本身。对此,雷纳·拉维纳斯(Lena Lavinas)指出,尽管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小额贷款计划曾是拉美主要的反贫困工具(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自本世纪初以来,附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已经脱颖而出,“……通过给特定的贫困人群提供现金或新的银行信贷而不是去商品化的公共物品或服务,它们成为吸引更广泛的各阶层民众加入到金融市场的强大手段”。

在我们看来,这种关于拉美的批判性争论的优点在于,它将新榨取主义视为一种由国家、文化规范、阶级关系和特定的社会—自然关系所支撑的经济模式。它基于并强化了与世界市场的屈从性一体化以及威权政治。此外,正是因为这些讨论,这一模式所基于的社会—自然关系以及它所造成的大量社会—生态难题和影响被政治化了。问题不在于要一刀切地拒绝以任何形式社会性地利用或占有自然资源,而在于这种占有主要是为了服务于资本主义世

界市场,这对自然和社会结构都造成了破坏。

三、规制理论视野下的 榨取主义发展模式

如上所述,我们已看到,当将新榨取主义经济模式置于一种广阔的语境之下时,存在着某种概念和理论上的缺陷。这一缺陷同样也反映在来自该地区的学者的批判性阐释中。比如,马查多·阿罗斯(Machado Aróoz)认为,将榨取主义主要理解为一种国家发展战略缺乏内在一致性,因为“它集中关注的是这些活动得以在其中展开的社会形态,却忽视了世界体系、控制开采速度和频率的规则、资源的使用以及所应用的技术”。同样,卡米拉·莫雷诺(Camila Moreno)质疑了以国家为中心来考察榨取主义的视角,指出其忽视了日益由中国的资源饥渴所主导的全球化世界的真实动力机制。因此,她认为,开采活动与工业生产过程和技术创新相关,而工业生产过程和技术创新又与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相关。以这些批评性观点作为出发点,我们提出将新榨取主义视为一种发展模式,这受到了规制理论的启发。规制理论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由于技术的、社会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发展以及社会斗争的偶然性结果,充满矛盾的资本主义多重关系,包括社会—自然关系,采取了十分不同的形式。这种多重关系可以暂时处于一种稳定状态,并为相对较长时期的资本积累过程创造一种社会环境。而这种暂时的稳定状态就可以被称为一种“发展模式”,它所指的是积累机制、监管模式和技术范式的一种特定组合。依此,我们在可以互换的意义上使用“development model”

和“mode of development”这两个概念。

规制理论在分析方面的出发点如下：正像我们经常的历史中所看到的那样，也正如我们当前所经历的，资本积累也可以发生在不稳定的条件下甚或危机时期。不过，当存在某些规制时，社会经济结构和进程会运行得更好；至于社会结构，比如阶级或性别，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更容易达成妥协或一致意见。社会整体的再生产正是通过那些采取着完全不同的策略、拥有极度不同的配置性资源和威权资源的个体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因此，社会再生产始终是一个不太稳定的过程，尽管进行计划和应对动态变化的能力会随着社会关系的暂时性稳固而有所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抽象层面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具体层面关注社会形态（通常是民族国家社会）。而规制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意图引入一个中间层次的抽象层面，以便确定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不同社会形态的各不相同、但大致稳定的发展阶段，例如福特主义这样的发展模式。发展模式这一概念考虑的是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这样更为具体的历史要素，而不是生产方式这样的更加抽象的术语。

宏观经济的一致性——一种有效的积累机制，在外围国家，它总是高度依赖于世界市场一体化的具体形式——是通过一种规制模式而得以嵌入在制度之中的。它囊括了“所有的制度形式、关系网络以及明确的或隐含的规范，它们确保了与社会关系的现状相符合，从而也与其冲突性特征相符合的积累制度框架内的各种行为的相容性”。这种稳定是通过广泛共享的社会价值观和以规制方式的形式得以暂时制度化的社会关系而实现的。罗伯特·鲍伊尔（Robert Boyer）如此描述了规制方式的特

征：它们确保贯穿于各种制度形式的具体表现中的基本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它们“掌控着”特定积累体制的再生产；最后，它们确保不必考虑整个体制的运行逻辑的个人或机构所展开的广泛的分权决策过程的动态兼容性。社会关系的相对持久性不仅意味着制度的强化，而且也意味着个人及诸如工会等集体行为者的预期和生活习惯的稳定。就此而言，一种有效运行的发展模式往往能够构建起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意义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霸权，即促成“集体意志的达成”的复杂机制。在这一意义上，霸权指以物质性内核——即大体上有效运行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以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进行妥协的能力和意愿为基础的支配型同意（domination - shaped consent）。

葛兰西所提出的概念是有用的，因为它正是要发现普遍化的（而非同质化的）社会经济、政治和观念的支配类型和机制。它带给我们的重要思考是，需要在全球视野下来考虑（新）榨取主义模式，即对社会—自然关系的资本主义规制并不意味着会废除往往是破坏性的自然占用形式；然而，自然的破坏并不必然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紧迫问题，因为危机的负面影响可以在空间上向外部转移并被暂时推迟。我们在拉美以及国际上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最后，规制理论的优势在于其对深刻的结构性特征、这些特征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变化以及它们与积累战略和其他许多社会行为的相互关系的洞察力。因此，从方法论上看，规制理论既着眼于各具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也着眼于其与前一阶段的连续性，即它试图彰显资本主义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空间上极度不

均衡的稳定时刻与危机时刻。

四、拉美历史上的榨取主义

拉美的历史是与原材料的开采密不可分的。而在历史上的每一时刻,历史上特有的自然资源占用形式都是社会经济再生产方式和权力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拉美,基于特定的世界市场结构、支撑性的政治经济和权力关系、特定的发展观念及其对社会包容性和排斥性的影响以及特定的话语理性(discursive rationality),我们可以确定榨取主义的不同历史阶段。下面我们将区分其四个阶段:殖民主义的榨取主义、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榨取主义、外围性福特主义的(peripheral-Fordist)榨取主义以及当前阶段的新榨取主义。

(一) 殖民主义的榨取主义(16世纪至18世纪)

殖民主义的榨取主义阶段从殖民大征服时期持续到19世纪早期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这一阶段关键的构成性和相互关联性特征是对贵金属特别是金银和土地的强制占有,以及特定的支配体系的建立。这一时期支配性的社会形式和榨取主义的做法建立在依据种族进行的社会分层的基础之上,这不仅使得人类自身相互分离,并为事实上不自由的劳动(即奴隶制)提供了合法性,而且还形成了一种与自然的社会关系,即专门为了满足人类需要而征服自然。在殖民主义时期,对于正在进行工业化的欧洲国家及其现代性观念而言,拉美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地之一,这也是殖民主义积累机制的先决条件。国际商业资本日益增长的力量以及世界经济总量的飞速增长推动着拉美地区原材料的出口。因此,必须从另一面来看待殖民

主义的榨取主义阶段,即欧洲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一方面,殖民主义的榨取主义是拉美国家中掠夺式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它也是全球劳动分工的基础,这一劳动分工至今仍在结构上有效,并且在各国国内引发了社会空间上的异质性的结构效应。其规制模式包括对中心国家的政治依赖、其经济需要导致的完全服从、种族主义和天主教会的强大作用。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那些依赖于本地所产的特定商品、自身的资源开采能力以及外部需求的地区处于不稳定状态,其物价处于不断的升值和贬值的交替波动中。

(二) 自由资本主义的榨取主义(1810年—约1930年)

榨取主义的第二个阶段与拉美国家的独立、“资本的时代”、外国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以及内部殖民化进程的浪潮同时发生。伴随着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经济繁荣,世界市场在大英帝国的引领下得以迅速扩张,并建立了一个名为“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的世界秩序。自19世纪中期开始,一种“新殖民主义秩序”出现了。在这一秩序之下,拉美发展成为当时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得益于殖民地时期原材料积累机制的延续,该地区有了一种稳定的发展模式的某些特征。支配性自由贸易政策似乎是有效的,并促进了资本主义在拉美的渗透(尽管并非所有地区)。基于这些带来稳定和发展的模式,新殖民主义秩序形成了强大的结构性强制力,与寡头民主制一起确保了由自由贸易所支配的原材料开采体系的推进。此外,最初的国家福利项目有助于将活跃的工人阶级吸纳进这一政治体制,从而从内部强化这一政治经济秩序。

它之所以不是上一阶段的延续,主要

与如下事实有关:拉美如今不仅是消费品进口国,而且诸如机器等生产资料的进口国。资本输入导致了开采部门的技术现代化,而国际资本的参与促进了该地区与国际金融体系的直接联系。在一些国家中,这促成了买办资产阶级的兴起,所谓的“玻利维亚锡贵族”是其典型。随着原材料收入的积累归于私人,这一阶级的成员获得了很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从而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榨取型国家”(extraction states),其目标是在国家层面上实现这一群体的利益。国家内部形成的另一个权力中心是大地主家族,其物质力量基础由于内部殖民化进程而得到增强,这通常涉及对土著地区和教会土地的强行占有,以满足宗主国日益增长的对原材料和食品(糖、咖啡及谷物)的需求。此外,内部殖民化进程还包括对新的原材料,如硝石、海鸟粪、橡胶和石油的染指。

(三) 外围性福特主义的榨取主义 (1930—1970年)

与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相伴随的是危机和战争所导致的世界市场的多轮崩溃以及新殖民主义秩序的衰败。

自工业资本主义产生以来,资本主义的、父权制的和帝国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获得了某种稳定性和霸权。然而,社会—自然关系的稳定恰恰是由这一关系在环境方面的不可持续性特征所带来的,特别是在(外围性)福特主义时期。多种社会制度,比如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国家,确保了破坏性的和支配型的社会—自然关系获得了某种霸权地位。在应对矛盾的意义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关系进行社会规制是可能的,事实上也是如此;这也是政治的核心动力机制之所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种外围性福特主义的发展模式在拉美出现。其特征是新的世界秩序的巩固、“美式治世”(Pax Americana)、工业化的部分成功、拉美发展型政府的出现以及早在1950年代就开始的负债趋势。

这种发展也有其内部原因:在1929年经济危机以及对拉美原材料出口产品的需求下降后,新一波强大的经济民族主义浪潮占据了上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并结束了19世纪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模式。一些重点行业被国有化了——比如墨西哥的石油业。新的经济政策范式是“进口替代工业化”(ISI)。本国工业的建设以及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支持旨在减少对进口和原材料出口的依赖。在这一背景下,拉美发展型政府出现了:政府设置保护性关税,将收入从出口部门转移到面向国内市场的部门;整合城市中上层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利益(至少在初期是如此),并经常反对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一发展政策模式以“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而著称,具有鲜明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导向,可以被称为“保守主义的现代化”或“追赶式发展”。在当下的讨论中,一些学者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逻辑视为该地区选择了一种后榨取主义的、自主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它结束了该地区对工业制成品进口和原材料出口的依赖。尽管该地区原材料加工产业的提升将削弱其出口导向,增加拉美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在价值链上所控制的部分,并必然有助于该区域经济的生产基础实现多样化,但我们认为,这并不一定会从整体上克服新榨取主义。首先,在该地区存在着大量的政治经济不平等和权力不平等。比如,如今安第斯地区的大量原材料是出口到巴西和阿根廷的。因此,

一种区域性的解决方案将很可能会加深这些不平等,并再现时空上的不平等——只不过如今是在区域层面上。再者,跳出民族国家的分析层面来看,需要重点考虑的是在(外围性)福特主义下,破坏性的和支配型的社会—自然关系也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为了克服新榨取主义,所需要的不仅是要结束以出口为导向,还需要在国家范围内和世界各地实现对支配型社会—自然关系的激进转型。

然而,尽管工业部门在持续增长,也采取了一些国有化措施,但前一阶段以原材料开采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并未真正走向终结。相反,随着社会力量格局的变化,在美国的霸权地位不断增强、以及它对该地区战略资源的专属权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情况下,该地区出现了一种特定的国家民族粹主义的榨取主义。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委内瑞拉,1930年代,一种大众民族主义的发展模式在该国已经成为了主导性力量,这一模式的基础是为了出口而开采新发现的油田,它在现代化和进步方面许下了承诺,流行口号“播种石油”(sowing oil)就是这种承诺的集中体现。

从1960年代开始,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更多矛盾涌现出来:经济增长下滑、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下降、为国家投资提供必要资金的税收收入枯竭,以及由于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导致城市底层阶级的人数大幅增加,从而使得实现城市底层阶级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承诺被放弃。土著居民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这一阶段的积极性发展之外,或者,他们被去种族化并作为新兴的城市周边地区的农民或居民融入到国家之中。

伴随着福特主义的危机,全球能源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并引发了进口替代危

机。“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工业化”的期望终未实现,因为其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需求量并不大。此外,债务多被用于有利可图的消费贷款。

五、全球“商品共识”时代的新榨取主义

与外围性福特主义阶段相似,当下的新榨取主义发展模式是一种拥有“强政府”的追赶式发展模式。“强政府”既承担了企业家和调解人的双重角色,又要保证原材料开采和利润积累所需的基本条件。同时,它又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前一阶段有所不同,主要原因在于自然资源及其社会占有在已经改变的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国家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形成了特定的世界市场格局,出现了新的技术,以及各种资本增殖策略的涌现。此外,相关的国家和国际政策、文化规范和行动准则也正在发生变化。就分析新榨取主义的影响性因素而言,我们可以把新时期的榨取主义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始阶段,大致涵盖了从1970年至2000年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榨取主义/新榨取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备选项,随后的第二个阶段开端于新世纪,并仍在进展之中。

(一) 新自由主义阶段(1970年代—2000年)

随着在1970年代占据了上风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实施,之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其主导模式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发展主义,通过偿债机制和结构调整,这一模式导致了世界市场的权力和动荡对社会的直接影响,而这最终为拉美经济至少部分走向重新初级化创造了条件。1980—2000年间,拉美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例停滞在

5.5%以下,但在一些原材料部门,特别是采矿业,其出口比重却节节攀升。然而在总体性的结构调整过程中,对原材料的控制也发生了变化。在矿产部门,跨国公司的重要性大大提升,比如在智利和秘鲁,与此同时,所谓的跨国经营也使得巴西淡水河谷公司(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这样的前国有企业逐渐进入全球性企业的行列。在农业生产部门,逐渐建立了高度工业化的全球化生产体系,与之相伴随的是土地使用和获得权分配机制的转型,而参与者的范围也发生了改变:土地所有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自由化,而来自拉美和北方富裕国家的跨国公司变得日益重要。与此同时,这些发展加剧了危机,因为通过出口和直接投资实现有活力发展的目标并没有达成。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新自由主义的并且威权主义倾向越来越强的格局和发展被社会运动所政治化。其中最显著的表现之一是1994年1月1日在墨西哥东南部发生的萨帕塔起义。

(二) 通过新榨取主义实现的产业重新初级化(2000年至今)

产业重新初级化的第二个阶段始于2000年左右,尽管最初表现得并不明显。这一阶段是由全球对农产品和矿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而促发的,这往往会改变初级商品与二级商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例如,2008年石油价格上涨至每桶140美元。尽管由于经济危机,石油价格后来下跌,但2011—2013年间的平均价格水平仍维持在107美元左右。矿物、金属和矿石领域中的价格上涨甚至更加急剧。而在农业部门,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发展趋势,其中伴随着以高能源投入为基础的农业综合经营生产方式的强化,这对社会和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必须加以考虑的是世界市场结构的变化,其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本身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工业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强化,可以将其特点描述为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深化和扩张。在较低层面上,这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半外围地区实施的经济上充满活力的工业化模式,与之相关联的是对消费品的需求日益增长。根据最新估算,尽管采取了各种节能增效措施,但预计到2030年,世界对主要化石燃料的需求仍将会上升近45%。此外,我们正在目睹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崛起,特别是中国,它在2010年消费了世界化石燃料的20%、主要农业资源的23%和黑色金属的40%。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它正在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上阶层,因而也正在经历这些“新消费者”的能源密集型消费方式的扩张,例如肉类、电子产品和汽车的消费,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饲料、矿石原料和化石燃料的生产。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世界贸易在1990年至2008年间翻了两番,但南南贸易增长了10倍以上,并且在经济战略中变得日益重要。需要指出的是,在拉美面向亚洲的出口中,原材料占到了90%。在这一地区,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而其中绝大多数投向了只开采而不加工原材料的企业。同样,中国在向拉美国家提供信贷方面也发挥着主导作用。

促使榨取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国际因素是,全球北方富裕国家的环境规制和抗议活动导致诸如铝和钢铁生产等“肮脏工业”向全球南方贫穷国家转移。毕竟,如果没有原材料开采的话,即便是可持续的、低碳的“绿色经济”也将是无法运转的。目前生物燃料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特

别是石油、甘蔗和玉米)需求的增加就明显体现了这一点。

鉴于价格的持续上涨、地缘经济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某些资源可能耗尽的预期,在上述世界市场格局中确保获得资源的政治战略变得日渐重要。欧盟在2008年实施并于2011年更新的《欧盟原材料计划》以及2010年德国政府的原材料战略都是很典型的例子。此外,作为实际性或投机性投资的对象,原材料及其开采对于金融资本越来越有吸引力,这一事实对当前价格走势具有影响。

当前拉美原材料繁荣的另一个条件是,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区域的政治重要性已经改变。区域发展和一体化既是拉美当前发展模式的前提条件,也是其导致的结果。这既体现在新的合作努力和区域性协议上,也体现在涉及大坝、公路和港口等的跨境建设的区域基建政治(infrastructure politics)中。因此,区域基建政治被用于空间的重组和生产,并为自然资源的增值创造前提条件。

在这一语境下,阿科斯塔提到了“商品共识”(commodity consensus),即一种新的全球格局,其中尽管存在生态危机和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政治化,但占用自然资源的榨取主义形式仍是主要的全球化动力机制。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维持不变,这体现为拉美国家的经济继续融入世界市场并处于从属地位,在全球政治经济中也几乎没有设计和选择自己道路的可能性。而新的情况是,资本增殖不再像过去几十年中那样通过私有化、自由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或结构调整来实现,而是通过以相对较高的世界市场价格进行资源榨取来实现。这是人们经常使用的术语“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意涵。但目前的矛盾处境

是,拉美的进步主义政府所获得的社会政治方面的行动空间,既是此前的群众组织和动员的结果,也是其体现,而这得益于世界市场所需的自然资源持续大幅增值。这导致了社会福利项目的大幅增加,带来了积极的政府经济政策,也会进一步提升中下社会经济阶层的预期。

六、社会政治的和结构性的回应

一些拉美国家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在争议中制定并实施了自己的新宪法(比如在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新宪法不仅规定了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及自然权利,还承认文化差异以及属地自决权和自主权。然而,过去几年的实践证明,在新榨取主义背景下实施此类宪法存在诸多困难、矛盾和争议。土著组织的政治参与使得与新榨取主义的社会—自然关系有关的争议性议题突显出来,而这些国家的新宪法规定了诸如“美好生活”(buen vivir 或 vivir bien)这样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显然并不意味着与自然的榨取主义关系。

与此同时,新榨取主义阶段也在整个大陆引发了国家现代化的重要进程,包括创建基于新榨取主义的法律框架、新制度和民主掌控机制。始于1981年的巴西,拉美大多数国家建立了高级别的环保机构和环境保护法。随后,从2002年开始,通过了规定开采活动必须保持透明以及公众有权获取相关信息的法律。然而,这些法律规定总是存在争议,只能部分得到实施。在许多国家,虽然公众能够获得有关开采的数量和价值总额的信息,但是有关开采合同和特许经营权的条件的信息只是部分公开或难以找到。有关所获收入的确切去向的信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自2012年以来,拉美许多国家在环境的规制、掌控、透明度以及民主的分权决策方面出现了严重倒退。为了应对商品价格的下跌,各国现在几乎是不计成本和代价地为吸引外商投资而展开竞争。尤其是,开采活动必须获得不受约束并掌握充分信息的人们的事先同意这一规定(其依据是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以及2007年的《联合国土著民族权利宣言》,这一规定被一些国家所接受并被写入了法律)甚至在实施之前就已被削弱或失效。在玻利维亚,第2195号总统令(2014年)实际上废除了土著居民依据宪法所获得的自决权,而第2366号总统令(2015年)则允许在保护区进行油气勘探。

许多国家的环保机构以及防止环境破坏的监控和处罚机制也遭到重建和削弱,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完全废除了。与此同时,国家机器中与榨取主义相关的机构(比如采矿、能源或农业部门)的政治权力得到加强,其中的一些部门与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的强势部门,如财政、工业或市政工程等部门联合起来。在委内瑞拉,环境部在2014年9月初被解散,其职能被划归到居住与住房部。同年,在厄瓜多尔,环境部被置于战略协调部的协调管理之下,它同时也协调管理油气和能源部门。在巴西,环境管理局被拆分为两个机构,而在乌拉圭,其总统何塞·穆希卡(José Mujica)一再要求对该国的环境和住房部进行拆分。在哥伦比亚,绕过国家环保局的相关政策,第041号最高政令(2014年)建立了对采矿活动颁发环境许可证的“快速通道”制度,允许企业只需呈交环境管理计划就可以开工,而不必等待当局的批准。在这种情况下,将土地划分为“未使用的”或“退化的”这一做法体现了一种与自然

资源的估值或占用这一特定目的有关的话语建构和规范设定,而现存的土地的非商业性使用很少得到批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威廉·萨赫(William Sacher)在定义被宣布为适合于原材料开采的区域时强调了其动力机制和社会政治维度。在政治和社会层面被界定为矿产区或油田区的区域实现扩展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厄瓜多尔的亚苏尼国家公园。2013年8月,当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总统宣布结束“把石油留在地下”的政策后,它从全球范围内的环境和气候正义政策的标杆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待开采油田。

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经历了所谓的“阶级妥协的局部重构”,其核心是利用初级部门的高经济增长率来大幅增加可供政府分配的财富。在许多国家中,其结果更多是基于原材料的收入的增长,而不是工业部门的扩张,前者使救助性政策能够得以实施。在中左翼或左翼政府掌权的国家,这使得数百万人摆脱饥饿,并使得政府在穷人中获得了较高的合法性,也形成了国家民粹主义的、支持拉美一体化的政治话语。然而,关于这些变化的持续性和结构性特征还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观察到,拉美大陆中产阶级人数显著增加,已达到总人口的1/3。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是玻利维亚。矿业合伙人和古柯种植者以及其他艾马拉族群都经历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流动过程,如今成为新的精英阶层的一部分。

而另一些人尽管也注意到了再分配政策的成功之处,但更多强调的是当前发展的矛盾性特征,他们指出了其结构性和战略性弱点。一方面,生产部门并没有实现重组,另一方面,对世界市场的融入和依赖度正在快速增加。因此,有越来越多的批评不仅指向这些政策的生态效应,而且也

指向了政府所采取的分配政策的类型。人们批评政府所采取的分配政策没有改变社会权力关系,所以没有什么土地改革方面的举措。总之,这一模式既没有从根本上突破现代性所标榜的进步和发展信条,也没有与传统的权力和统治关系彻底决裂。

除了上述方面,榨取主义战略还会引发许多社会内部的冲突,特别是在那些拥有新宪法和以前发生过强大的土著运动的国家中,比如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在这些国家,政府和国家机器苦苦挣扎于一种巨大的困境之中,一方面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分权化和民主化,另一方面是有可能走向威权主义的、打着国家利益旗号的发展型国家。其中,后者是在国家和社会中通过一种等级制的、威权主义的、甚至是军国主义的信条来实现的,在这一信条看来,我们必须大力推动发展,捍卫社会以抵御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敌人:

因此,榨取主义与政治领域中集权主义和威权主义趋势的强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能够无限地、不受控制地获取国家最有利可图的资源的领导层,可以很轻易地确保其统治的延续,而不必以平等的方式来对待各种自治的社会力量,即使它不得不服从于定期进行的自由选举。

对这些发展的学术性评估与社会政治性评估之间存在着分歧。有人认为,从中期来看,一个更强有力的国家和收入分配构成了社会中权力关系转变的基础,这显然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及其组织。相比之下,最近的批评指向了行政职权的显著集中以及对权力分立原则的侵蚀,尤其是在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因为行政权力已经控制了立法、司法和选举权。在这两个国

家中,那些曾经通过斗争而让这些进步主义政府上台的群众组织已经被严重削弱了,而且现任政府的批评者经常遭到起诉。

尽管拉美当前的许多经验都表明采取其他发展道路是可能的,但迄今为止的替代性方案仍局限在榨取主义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它们所代表的是一种从当前世界市场的高价格中获利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形式,但这一形式并不会改变支撑着它们的基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或权力关系。

当前诸多难题的核心在于依赖化石燃料的工业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外围性)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模式、大体有效的社会妥协以及稳定的福利制度,在全球北方富裕国家以及全球南方贫穷国家中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是一种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发展方向。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福特主义模式恰恰由于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强化而得以延续和局部深化。

七、结论

综上所述,自1970年代,特别是2000年以来出现的新榨取主义发展模式具有如下特征。首先,不断变化的世界市场格局以及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有利于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一直维持在高位,在2014年之前,这在许多地区都推动了世界市场价格的持续高企。其次,资源榨取主义行为的出现和持续存在明显依赖于基于制度和司法保障的特定国家行为,以及对财产权和使用权的保障,也就是,对土地和林地的特许经营权或所有权的授予,而环境规制措施仅仅是得到部分实施并在后续过程中遭到破坏。同样,它还依赖于在基础设施上对原材料的勘探、开采

与销售所提供的支持和授权,这体现在道路、港口和管道建设方面。这些做法还得到了话语层面上的进一步支持,这一点在关于在所谓的未使用或退化地区种植农业燃料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的辩论中表现明显。在中左翼或左翼政府掌权的国家中,国家实施的分配措施不仅使上层的社会经济阶层获益,也使中下层特别是中间阶层获益,它还有助于整个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因此,尽管其内部存在各种矛盾和冲突,但榨取主义完全有可能形成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榨取主义构成了霸权性社会关系的基础,其强势发展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采及其在世界市场中的销售。最后,新榨取主义的动力机制尤其体现在如下的社会冲突中,一方面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分权化和民主化进程,而另一方面是向威权主义国家政策模式的演进趋势。这里的冲突所关涉的,不只是对于作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基础的自然产品或从开采活动中所取得收入的获取权,还与不同的繁荣观念、彼此竞争的世界观和对自然的理解、政治程序和秩序概念以及对身份的认知和属地自决有关。

这些争执表明,新榨取主义不只是一种资源占用的经济/技术形式或拉美经济模式的复兴,而应被视为一种政治统治关系的集中表达,其中,一种新发展模式的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政治的维度与冲突并存。不仅如此,对于谈论社会生态转型而言,这些争执也是十分有趣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生态问题的存在,而其解决明显需要发生根本性转型(这是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的宪法所规定的)这些与相当有限的政治和社会行动空间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拉美,榨取主义的批评者往往倾向于促进一种会强化最广

泛意义上的政治的话语及相关实践,即冲突性的、民主的社会构建。因此,他们关注的重点不仅在于政策本身,还在于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父权制的和帝国主义的逻辑。

对当前我们在拉美所能看到的新榨取主义发展模式的分析不仅能推动当前发展政治学理论的成熟,也会激发我们去思考同样影响着社会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的那些社会政治和社会理论方面的诸多挑战。对于由本文所提到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态关系及其主要的发展动力机制所构成的全球性背景的集中关注,有助于我们对替代榨取主义的其他可能的变革性多维方案进行评估。这其中包括国际规则和规制的必要改变,这是最为重要的,但同时也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社会技术构型、社会—自然关系以及盛行的象征性价值导向(例如,进步、自由和增长的观念)的必要改变。最后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这种社会—生态变革必然要求合理应对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社会实践,以便最终克服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帝国式生活方式所依赖的社会关系。例如,这其中所隐含着的意义之一就是,需要逐渐弃置那些廉价的、以不可持续的方式生产的商品和劳动力。■

[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国际政治系;克里斯蒂娜·迪茨(Kristina Dietz):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拉美研究所;米里亚姆·兰(Miriam Lang):厄瓜多尔安第斯西蒙·玻利瓦尔大学;刘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周艳辉)